

〔日〕羽田亨著 耿世民译

西 域 文 化 史

新疆人名译注

卷之三

西漢文忠公集



K300/2

西域文化史

〔日〕 羽田亨 著
耿世民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841474

DOSS/69

西域文化史〔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 $\frac{1}{2}$ 印张8插页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3,000

统一书号：11098·13 定价：0.42元

原序

西域文化研究在这半个世纪所取得的显著进展，应归功于在该地区内外学术探险发掘的结果。过去根据散见于中国和西方诸国记录中的史料，关于这一地区提出的许多学说，或被否定或被肯定，同时对过去未曾研究的许多历史上重要的问题重新进行了研究，成功地揭示了古来西域文化之情况，此诚为学术界的快事。新发现的这些贵重的史料在种类和数量上虽很多，但多为残简断片，而且在典籍和记录类中，有的是用现在尚不太明了的语言写成的，这给研究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其研究成果只有待之他日。尽管如此，考虑到在目前研究阶段上已能对西域文化画出大概的轮廓，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有责任大体上把这些材料综合起来公诸于世。出于这种认识，我才不揣冒昧决定刊布此书。

此书曾题作《中央亚细亚的文化》刊行在岩波书店的《东洋思潮》中。现在几乎在每页上都对原书有所增补与订正，并附有主要引用书目和插图多幅。对前书不完备之处，略得补正，幸甚。

羽田亨

昭和22年（1947年）9月10日

目 录

前 篇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西域的民族	6
第三章	西域史的曙光	12
第四章	亚历山大的东方经略与巴克特利亚及安息	16
第五章	民族的移动	21
第六章	汉之西域经略	23
第七章	贵霜王朝	26
第八章	佉陀、突厥之活动	28
第九章	唐之西域经营与伊斯兰教势力之东渐	31
第十章	回鹘的西迁	34
第十一章	蒙古的中亚经略及其以后	36

后 篇

第一章	西域与希腊文化	40
第二章	粟特人与商业	45
第三章	粟特语及天山南路通行的诸种语言	49

第四章	西域流行的各种宗教及其典籍	54
第五章	宗教美术	67
第六章	西域与汉文化	76
第七章	回鹘的西迁与西域文化	83
第八章	突厥族与伊斯兰教	90
第九章	帖木儿王朝与突厥文化	96
第十章	其后之概观	103

图 版 目 录

- 卷 头 克孜尔千佛洞壁画
- 第一图 贝希斯屯 (Behistun) 磨崖碑
- 第二图 大夏诸王之货币 1, 2, 3
- 第三图 于阗、龟兹、吐火罗语之佛典 1, 2, 3
- 第四图 粟特语文书及叙利亚语墓志 1, 2
- 第五图 汉文摩尼教及基督教经典 1, 2
- 第六图 敦煌千佛洞 1, 2
- 第七图 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供养人像
- 第八图 克孜尔千佛洞画家像
- 第九图 飞天图 1, 2, 3
- 第十图 库木吐拉 (Qumtura) 千佛洞唐代壁画之飞天
- 第十一图 库木吐拉千佛洞晚唐时期之壁画
- 第十二图 摩尼教绘画 1, 2
- 第十三图 基督 (?) 画像
- 第十四图 木简、竹简 1, 2, 3, 4, 5_a, 5_b
- 第十五图 陀罗尼神咒经

前 篇

第一章 绪 论

西域一名，古来用作泛称中国以西诸国，或只限于用来称呼葱岭以东的所谓天山南路地方。本书则指一般称作中央亚细亚的地域。但所谓中央亚细亚地区在学术上并未划出一定的界限，有的学者指出有广、狭它二义的区别。我用此名来指大体上相当于亚细亚大陆的中央部分，包括广大不通外海的河水流经的诸地方。从而此名称所包括的地域，大略指以帕米尔(Pamir)高原为中心，东面包括注入罗布泊(Lop nor)的塔里木河流域的东突厥斯坦(Turkestan)，即新疆天山南路地方；北面包括流入伊塞克湖(Issik kul)、巴尔喀什湖(Balkash nor)、阿拉湖(Ala kul)等的河流流域的地方，亦即包括伊犁、准噶尔盆地等在内的天山北路地方；西面包括楚河(Chu)、塔拉斯(Talas)河流域和注入咸海(Aral)的河流流域的地方，亦即西突厥斯坦；南面以昆仑山脉、兴都库什(Hindukush)山脉为限。德国地理学家李希托芬

(Richthofen)^① 曾用此名指诸水成漕不通流的亚细亚大陆 盆地地方，大体包括南从西藏高原北到阿尔泰山脉，西从帕米尔分水岭东到黄河分水岭及兴安岭山脉地区，而帕米尔以西注入咸海、里海诸河流域则与其余地方一起划入 其周围地区。我从历史研究的立场出发，把这一周围地区的一部分也包括进来。

这一地区东面为中国东部、蒙古，西面为波斯，南面为印度、西藏所包围，处于亚洲诸大势力之中 央，应自成一区。然而对各种情况稍加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并非完全如此。从地理、人种、文化等方面来看，这一地区至少可大致分为三个地方，即：第一为天山南路地方；第二为葱岭以西，以锡尔 (Syr)、阿姆 (Amu) 两河之间为中心的地方；第三为天山北路和俄属七河省地方。这些地方各以高山、大河相隔。据有此地的人种，也因时代不同而各不相同，从而在文化上也有明显的差别。从这方面来说，这些地方应分别对待，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间的历史发展似有些 不太合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古来这些地方曾发生过很密切的政治关系，有时大部分、有时全部统一于一种势力之下。即使不是这样，在因相互并立而发生侵略或联盟时，山河自然的阻隔也未曾阻止其相互间的密切关系。这样就在原来不同的人种、文化方面，自然产生了相互的融合。正如后来这些地区称做突厥斯坦所表明的，突厥人在整个这一地区最后成了主要居民。除了西面进入波斯、据有小亚细亚进而侵入欧洲的部分外，在研究其余突厥族的历史时，不能不把居住在这一

① F.V.Richthofen, «China» (中国), I, 1877, p.7.

地区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所以，尽管这些地方相互间存在各种差别，但作为一个整体——中央亚细亚来研究其文化发展的历史，不但是可行的，而且也有充分的理由。单从它处于中国与波斯、印度诸大国中间这一地位来说，就不能漠然视之为简单的地理概念。

再有，应注意的一点，这种研究除其本身的目的外，尚有另一重要意义，即不仅关系到中央亚细亚，而且对其邻近诸国历史研究上也有极重要的关系。在研究上述诸国相互间的政治、文化交往事迹时，如忽略了对此地区的研究，也是达不到目的的。这样说并不过分。因为如前所述，中央亚细亚这一地区或为中国、波斯、印度诸国所占有，或为突厥、蒙古、西藏等剽悍民族占据之地所包围。从地图上一望可知，位于其中央的这一地区绝不具备出现强大国家的自然条件，古来也未兴起过以此地区为根据地的大势力。这一地区仅在14世纪末出现过强大的帖木儿帝国，而这一点毋宁说是历史上的例外，只是由于当时亚细亚诸国的情势才使它称霸一时。所以，历史上这一地区经常受其周围势力的侵略，成为四方争夺的目标。就中央亚细亚本身而言，由于上述各种不同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作为侵略的目标来说，其间也有不同。例如，中国古来曾多次对所谓狭义上的西域进行经略，正如象当时经世家所说，保有此地，除了能达到避免北方剽悍民族侵掠其本土的主要目的外，还能确保通往西方的贸易交通。而从北方民族的角度来看，经略此地除了获得贡物外，还便于攻掠中国内地。而西突厥斯坦就其富庶而言，远远超过前者。所以作为攻略的目标来说，理由也有些不同。从其西部的波斯对东北方的游牧民族来说，或从这些

游牧民族对波斯来说，情况也和前面所讲的一样。实际上两者之间曾对西突厥斯坦进行过多次的争夺战。所以中央亚细亚这一地区，伴随其周围国家和民族势力的盛衰，虽然程度不同，总是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这一点几成为不可避免的命运了。中央亚细亚，一方面是周围诸大势力的缓冲地带，另一方面相互远隔的亚细亚各大强国又通过此处连结起来，建立了不可分离的相互关系。

中亚同其周围诸国的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极其明显地表现在文化历史上。东方中国、南方印度、西方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等诸方文明的交流传播情况，是历史上最有兴趣的现象，也是重要的研究课题。而这种文明的交流传播，不言而喻，是以相互间的直接或间接交通的存在为前提的。东西交通在海路交通发达以前，中央亚细亚是最普通的通道。就是在海路发达之后，如取陆路也必须经过此处。不仅从波斯、阿拉伯、欧洲东来，就是从南方印度来中国，通常也是先北上进入中亚，然后再折向东方。对当中西交通之初、和前后开拓的蒙古地方与西方交通而言，无疑也是经过这一地区的一部分。所以在东西交通史上或东西文明传播史上，此地区的历史也具有很大的意义。但应强调指出，从来在这一点上认识到西域史意义的人，只是注意到东西交通通过此处，东西文明经过这里相互传播，而进一步对它如何行于此地，如何发展等方面，则未太注意。这是西域史研究尚处于开创时期不可避免的情况。凡如文明的传播等现象，在过去主要靠陆路交通的情况下，从甲地传到乙地，原则上一般都是渐次波及相互邻近的地区，然后才间接地传到远方（飞越中间地方是极少的特殊情况。海路交通只经过

比较少的港口，与陆路不同）。例如西方诸宗教的东传，在其传入中国以前，必须经过地当通道的西域地方，也即经过富有宗教热情和思想的伊兰人种或与其类似的人种居住的地方。这些宗教先传入此地，然后再从这里传入中国内地，这是很自然的事。艺术和学术的传播也是如此。要之，在东西文明相互传播上，此地区起一种纽带作用。这一点也与上面所谈这一地区对周围诸国政治方面的位置相当。作为其间的纽带，诸方文明在这里或因相互融合，或因当地民族加进了自己的东西而产生一些变化，甚至出现与本来面貌很不相同的东西，但仍以本来名称更向东西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如不研究此纽带地区的文明，而径直研究处于两端的东西，那是不能得其正鹄的。所以，对于此地文化史的研究，除有其自身的重要意义外，对周围诸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

以上我们规定了所谓西域一词的含义，说明了西域史成立之所以，也简述了其在范围广大的东、西方历史上的意义。以下所论述的当然是以此地为中心。但由于历史上的复杂现象，常常要求在地理上超出这一范围，况且西域史的一半意义尚在于其与周围诸国的关系。所以叙述上或从中国内地入手，或涉及到波斯和蒙古，这在我看来是自然的事情。

本书当然主要是论述古来西域文化发展的踪迹，但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方面的论述，要求要有关于居住在此地区民族的知识及一般史实的预备知识。由于一般人对这方面的情况不大知道，加之这方面的参考书又缺乏，所以现特分前后两篇论述。前篇主要概述一般史实，后篇论述文化。

第二章 西域的民族

现据有西域亦即中央亚细亚的民族为突厥人（如突厥斯坦一名所表示的），但古代未必如此。从前章所述中亚属于三个区域考之，天山北路到谢米列契（七河）一带，从记录时代之初起是否就是突厥人的居住地，这一点还不易判定。据前汉到南北朝（即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记载，今伊犁、天山北部山谷之间的地方为乌孙族所据有，他们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此族之语言依现存资料认为是属突厥语。但唐代颜师古谈到乌孙的容貌时说：“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①据此，不能一概断定为突厥人。颜师古所用胡人这一名称，当时无疑是指以今萨马尔罕(Samarkand)为中心的粟特(Sogdiana)地方的人，即伊兰人种。所谓“青眼赤须、状类猕猴”，正是这一人种风貌的描写，而不是指突厥人。类似的例子尚见于他处。如现为突厥种之一的吉尔吉斯(Kirghiz)族（汉代称坚昆、鬲昆，南北朝时称契骨、居勿、结骨，唐代称纥纥斯、黠戛斯。其语言至少在唐代已突厥化），关于其容貌，《唐书·回鹘传下》附《黠戛斯》条中说：“人皆长大，白发、皙面、绿瞳，以黑发为不祥，黑瞳

^① 《汉书·西域传》乌孙条注。

者必曰〔李〕陵苗裔也。”这也决不是突厥人的容貌，而应为伊兰人的种族特征。突厥族一般传说以狼为族祖。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四中也说“坚昆部非狼种”，也就是说黠戛斯人非突厥种。根据这些记载，唐代据有今叶尼塞河上游明显操突厥语的黠戛斯族，本来不是突厥种，而是一种亚利安种，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才突厥化的。颜师古关于乌孙的记载可能不是简单的臆说，有何根据我们无从知道了。欧洲学者中有人认为乌孙当是古代记录中属亚利安种的游牧民 Assi 族^①。而乌孙是在前汉文帝时代驱逐了从今甘肃省内逃到这里的大月氏族而据有该地的。而大月氏又驱逐了在此之前的塞族据有该地。关于塞和大月氏属于什么人种的问题，虽尚未确定，但一般认为属亚利安种。果如是，则大月氏在记录之初人种分布上，作为亚利安种东进的先锋，竟一直进入甘肃省地方了。

谢米列契（七河）省南部一带从汉代起就住有称做康居的部族，其势力及于粟特地方。依其生活状态和语言，也认为是属突厥种。关于此族没有象乌孙和黠戛斯那样有关于容貌特征的记载。把它说成是属突厥族于记录上不是什么不合适的。但语言、风俗、生活情态的相同或近似，并不是说人种也完全相同（如前述黠戛斯人的情况）。时代越往后，人种混合的程度越厉害，一般已不存在纯粹的种族类型，也不能以

① W. Kingsmill: 《公元前中国与西域及邻近国家的交流》，载 J.R.A.S., N.S., Vol. XIV, 1882, p. 74—104; Charpentier: 《吐火罗人的人种位置》，载 ZDMG, 71 Bde., 1917, S. 347—388.

今日世界人种知识来细致区分古代民族。康居何时据有该地也不清楚。再有，是否当这一带住有如康居族时发生了亚利安系种族的入侵，反之，或当亚利安种族扩张时发生了如康居的突厥种族的侵入，这些都属于史前的范围，现在难以判定。总之，当此地有记录之初，从天山北路到谢米列契一带，就住有可认为是属于亚利安系和突厥系的游牧种族。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到前汉武帝时代（约公元前130年左右）大月氏又往西南方向迁移。代之而起的是突厥语族的乌孙据有该地，直到南北朝时期，无疑地，纯粹突厥种族占有此地应是以后的事。

其次，关于天山南路的民族，由于对该地进行发掘所得语言、绘画、骨骼、头盖骨等材料的研究，至迟在公元前后主要是为亚利安种族所居住，这是没有疑问的。

最后，关于锡尔、阿姆两河之间的地方，即其中央有名的索格底亚那沃地的居民，这里有必要的略微深入地谈一谈。上一世纪中叶学术界曾风行一种认为该地的某一地域是亚利安种族原住地的学说①。现在尚有一部分人坚持此说。现简述该学说何时、基于何种理由、由何人所提倡的过程。

由于欧洲比较语言学的发达，当18世纪末，欧洲学者热心研究梵语（印度古语）、赞德语（波斯古语）等，从而发现它们与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之间在词汇和语法方面有许多相同点。1786年琼斯（William Jones）提出这种相同点出自共同根源的学说，实为此学说奠下不可动

① Asiatic Researches 《亚细亚研究》 T. 1, P. 422 以及 Benfey, 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语言学史》，1869, p.348.

摇的基石。1833年后，德国语言学家鲍朴 (Franz Bopp) 刊行了梵语、赞德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哥特语、古代斯拉夫语、德语等比较语法^①，建立了印欧比较语言学这一学科。据这种研究，欧洲现存语言（除巴斯克语、芬兰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等以外）都属于同一语系，与亚洲现存语言中属于梵语系统的印度诸语，属于赞德系统的伊兰诸语 (Iran 与 Arya 为同一词源，为波斯称亚利安民族之用语) 以及阿尔明尼亚语等有密切关系，都包括在所谓的印度-日耳曼语系之名下。于是，进而提出这些属于同一种之语言必有其本源之母语，而说这些语言的人应出于同一祖先的学说。这种学说最初出现在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们中间。他们根据梵语、赞德语是印欧语最古形式这一点，提出亚洲、尤其是中央亚细亚为该语言之摇篮地。如波特 (Angust Pott) 认为由锡尔河、阿姆河两大河所灌溉的喜马拉雅山之北、里海之东地方为此民族之发祥地。此说至上一世纪著名梵语学家缪勒 (Max Müller) 遂其大成，几成为当时学术界之定说。他把鲍朴等称作印度-日耳曼语、法国英国学者称做印度-欧罗巴语的语言简呼之为亚利安语。把这个原指印度伊兰语的名称用来总称印度——欧罗巴系的语言，并于1861年提出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等的祖先曾住于同一房顶之下的亚利安族的理论^②，并因

-
- ① 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s Sanskrit, Zent,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 Lathanischen, Gotthischen und Deutschen (梵语、赞德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哥特语及德语比较语法)。
- ② Max Müller: 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语言科学讲话》), Ist Series, pp.211—212; Survey of Languages (《语言研究》), p.29.

语言上同一形式保存在所有亚利安族中而认为在印度人、波斯人之祖先向南方和希腊人、罗马人、凯尔特人、条顿人、斯拉夫人等殖民统率者迁到欧洲海岸之前，亚利安人的一小部分大概居住在中央亚细亚的最高地，说一种尚未分化为梵语、希腊语、日耳曼语，但已有此等诸语言的方言胚胎的语言。

但19世纪欧洲学术界之进步，不仅限于语言学。这期间人类学、史前考古学、地质学也大大发展了。依此等新兴学科研究者之研究则与上述学说不相容。于是亚利安民族中央亚细亚起源说受到了动摇。依人类学者、尤其是头盖骨学者和史前考古学者搜集的许多宝贵材料研究之结果，居住在现今西班牙、法国、丹麦、德国、英国等广大地区的住民的大部分是在新石器时代或甚至旧石器时代就成了据有同一地方的未开化民族的后裔，而与语言学家基于比较语言学的学说不相容。加之语言学家进一步基于语言的古生物研究也未对此种学说带来有利的东西，他们在原始印欧语中未能发现产生于中央亚细亚的动植物名称，相反地倒是有产生于欧洲的古生物名称，这也对亚利安人从里海东部地区迁移的学说造成了障碍。此说1868年一直为本费(Benfey)所主张①。而依其意见该摇篮地应在黑海北寻求。之后盖格(Geiger)②依同样方

① Benfey 说见1868年为 Fick, *Vergleichendes Wörterbuch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印欧语比较字典》) 一书所写的序言。

② Geiger, *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人类发展史》), S.113—150.